

国际名家燕园讲学录

Benjamin Lee (李湛恣)

杨彩霞

著
译

全球化时代的 文化分析

Cultural Analysi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全球化时代的 文化分析

Cultural Analysi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美国] Benjamin Lee 著

杨彩霞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美)李湛忞(Lee. B.)著;杨彩霞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
(国际名家燕园讲学录)
书名原文:Cultural Analysi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ISBN 978-7-5447-0219-5

I.全… II.①李… ②杨… III.文化-研究 IV.G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28505号

Cultural Analysis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by Benjamin Lee

Copy 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4-238 号

书 名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
作 者 [美国]Benjamin lee (李湛忞)
译 者 杨彩霞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插 页 4
版 次 2008年4月第1版 200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219-5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序言 / 1

引言 / 3

礼仪、交换和“语言学转向”的根源 / 9

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 14

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 17

第一讲：流通文化 / 22

概述 / 22

想象社会生活 / 30

结论 / 34

第二讲：述行性 / 36

概述 / 36

述行词的引申 / 42

弗雷格 / 44

对主体性的文学分析 / 47

述行性的对象化 / 53

第三讲：资本主义的述行性 / 57

概述 / 57

流通的述行性 / 58

资本的述行性 / 69

第四讲：流通风险 / 80

概述 / 80

风险的具体化和具体化的风险 / 98

流通政治 / 101

系统性风险 / 102

结论 / 104

参考文献 / 107

序言

我能与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文化和文学分析在全球化时代所发挥作用的一些想法,这要感谢主持人北京大学的刘东教授。要说现在在美国的文学和文化研究正处于危机之中,这话一点儿也不夸张。1970—1980年代,比较文学系位居人文学科的前沿,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系正在关闭。这种“人文学科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并不陌生,十年前他们有关类似危机(人文精神危机)展开的讨论预示着当今的发展。这不应该令人吃惊,因为中国一直就是一个最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力量的地方。我做这些讲座的目的就是想表明,我们在文化分析中如何运用一直被称为“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深刻见解,分析和理解正在影响我们大家的全球变革。

1987年我第一次到北京,十五年来经常回来。我就是早一代全球流通的产物,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外祖父是燕京大学(北大前身)的管理者,现在校园里还有我母亲从小居住的房子。我小时候,就常去日本、台湾和香港旅游,目睹着它们从全球的落后地区变成全球领先地位。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不敢喝当地的

饮用水,找可口可乐喝,心里纳闷怎么到处都没有冰激凌呢。现在我在北京,想到了这些变化,只是这里变化似乎大得多,也快得多。在北京,我每天都散步很长时间。我看到附近地区的变化,不仅仅是新添了有星巴克和麦当劳的购物中心,还有名叫棕榈春天、曼哈顿和温莎大道的公寓楼房。当地人谈话的内容似乎也跟我在香港和纽约听到的差不多,大家都在谈论房地产。但是,大约五年前,这些情形大多还不存在。美国人自以为处于全球化的前沿,但我认为他们根本不明白支配中国、印度和亚洲其他地区的变革。因此,我今天要谈谈中国知识分子大约十年前最先谈论的东西——全球化面前人文学和文化学的危机,也许就并不令人吃惊了。

这些讲座取自与迈阿密大学人类学系爱德华·李普马教授合作的研究与写作项目。原文是2003年秋天在北京大学的讲座,前面加上了引言,第四讲作了较大修改。

引言

新千年伊始,一切都变了,一切又都没变。话语与货币的流通、意识形态与形象的流通,计算机技术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流通,正在确定着人类活动的进程。的确,人们愈发意识到,只有通过阐明一种条理清晰的流通理论——我称之为“流通文化”,才能抓住当今时刻,即蒸蒸日上的全球化时刻。“流通文化”这一词语表明,最关键的文化形式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流通,流通与注入其中的文化形式之间互不可分。这一词语同样表明,最具决定性的资本形式是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流通的形式,那些最流动的形式,那些最不附属于任何国家经济或文化的社会再生产的形式。

当代全球化最关键、最明确的特征是日益强大的流通文化的出现。这些流通过程重新定义了价值本身的生产和可能性,由革命性的设计和技术发展的金融工具集中体现出来。这些连接性形式是全球不对称现象再生产的工具和表述,其关系非常新颖,跟以往的事物迥然不同。结果,全世界的人民、国家和社会运动都正在寻找权力地点和统治者身份。当代流通文化在重置统治的基本原则和政治权力的因素,虽然加强了对象化依赖的形式,但也正在产生

新型的主体性自由(例如个人应得权益的讨论)。流通作为准自治领域的扩展,伴随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权力技术和阐释体制,既彰显了一种早在资本降临之前就已开始的动力,也表明资本主义历史进入一个新阶段。

然而,正是流通的兴起产生了文化分析的危机。几乎所有当代文化分析的形式,比如文化研究、新历史主义和解构主义,都是“语言学转向”的产物。这个术语最初是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在1967年编辑的一本语言哲学论文集的书名,后来成为对语言和交流产生跨学科浓厚兴趣的标志。这种兴趣肇始于1960年代的结构人类学,很快便传播到文学、语言学和哲学研究之中,一直到今天的文学和文化研究。结构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和普遍主义者、建构主义者和基础主义者的争论至少有一样共同的东西,即他们都相信语言对于社会和文化分析的重要性。

问题是:在“语言学转向”激发出来的著述中,有一种把文化与语言等同起来的倾向。文化跟语言一样,被认为是共有的、地域的、即时的,是与更普遍、更抽象的全球经济过程对峙和抵抗之地。这已经产生了一种假设,即不同社会现在的共同点是,它们都对要以自身形象重塑世界的全球资本“同质化”作出反应。当代变革的前沿似乎是经济力量,它们被视为是在加速流通的人员、思想和商品背后的真正主宰。这幅画面中没有言明的是这样的预设:文化是静态的,而经济是动态的。文化固定不动,货币和商品则以从未有的速度在全球流动。目前,欧美人对全球化的理解都假定经济过程遵循自身规律,经济进行自我调整,正如在自由市场模式里那样。结果,文化和经济的分离已经成为当前许多全球化研究的基本先决条件。

然而,文化和经济方法之间会产生这种矛盾关系,并不让人吃惊。美国许多文化理论的前沿围绕着身份和主体性问题,通常以“身份政治”的形式出现。一个关键概念是“述行性”,即话语似乎产生了其所指。语言述行性成为文化述行性的模式,比如说,断定一个身份就产生了该身份,可能就像同性恋“公开同性恋身份”那样。

述行性这个概念似乎注定要流通。是牛津大学哲学家约翰·奥斯汀在哈佛大学举行约翰·洛克讲座时赋予述行性概念以哲学重要性,但他是从德国逻辑学家戈特利布·弗雷格那儿获取这种思想的,正是他把弗雷格的著述译成了英文。法国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在法国罗伊芒特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见到了奥斯汀,并把这些思想介绍到了法国知识分子那儿。在法国,通过皮埃尔·布迪厄和雅克·德里达的著作,这些思想成为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辩论的一个关键部分。在美国,哲学家约翰·瑟尔——奥斯汀在牛津大学教书时的学生,发展了一种言语行为理论,于尔根·哈贝马斯利用这种理论创造了他的普遍语用学。同时,言语行为理论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中非常盛行,激发了不同的思想家,如保罗·德曼、雅克·德里达、朱迪斯·巴特勒和斯莱沃伊·齐泽克。

奥斯汀使用述行性来批判哲学上一味关注语言的描述性或“记述性”用法。经数学和逻辑学发展的充实,比如戈特利布·弗雷格对于现代符号逻辑的发展,语言被视为用来表述命题,这些命题的真假值要依赖于把描述与一个独立现实进行比较。奥斯汀分析了一些看似描述但实际上产生了其所指对象的语言形式:“我答应去那儿”是许诺行为,而“他答应去那儿”只不过是一种叙述。述行语产生了其描述的东西,因此削弱了独立对应这一前提。奥斯汀认为,述行性并非语言的补充特征,而是其本质属性。本维尼斯特指

出,人称代词“我”和“我们”也是述行语:跟“猫”这样的普通名词不同,说“我”这个字时指的是说“我”这个字的人,把这个人指定为讲话的主语。他这样论述使奥斯汀的分析更加严密。本维尼斯特还认为,述行性是语言本身的基本结构原则。

然而,为什么对述行性那么小题大做呢?它为何如此重要,继续成为哲学、文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的根本问题呢?述行性似乎跨越了主体性和对象化的界限。如果语言不单是描述世界,而是可以创造世界,那么数学、逻辑和自然科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受到了侵犯:语言和语言所指对象的独立性,词语和现实之间的独立性。当词语创造了其所指时,人类便有了语言的魔力。在《旧约》开篇,上帝以为万物命名而创世。因此,难怪奥斯汀认为,如果他关于述行性的见解正确的话,那么从希腊时代以来的所有西方哲学都得重新思索。奥斯汀的激进主义并不唯一,与他同时代的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也就逻辑和数学的基础问题得出了类似结论。

如果我们探究一直位居“语言学转向”中心的语言与文化之间的类比的话,当代文化分析中述行性和建构主义的倾向就与许多经济学家把经济规律视为纯粹对象化并与自然科学规律相似的倾向发生冲突。这不应该大惊小怪,因为古典经济学是围绕从19世纪物理学而来的能量隐喻而建立起来的。文化的述行性可能使经济学家难以对文化研究产生兴趣,而当代经济学的形式特性和数学特性也使文化分析家远离当代金融。结果,尽管文化研究一直关注分析当代文化现象,比如媒体或大众文化,但把“语言学转向”的文化工具扩展到分析金融和资本主义新形式的严肃尝试却相对匮乏。

这些讲座的主要目的是发展可以应对当代“流通文化”的文化

分析形式。我们将试图克服文化和经济之间的隔阂,方法是:不把“语言学转向”的一些工具应用到文学文本、媒体或大众文化方面,而是应用到分析文化构成上,比如公共领域、民族主义、市场,甚至资本本身。构成流通文化概念基础的关键思想是:流通必须被构想为不仅是人员、思想和商品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的流动,而应看到,流通是一个文化过程,有其自身的抽象、评估和制约形式,它们是由特定类型的流通形式和围绕其建立的阐释性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出来的。我们正是把这些结构化的流通识别为流通文化。这些讲座将提取各种当代资料,其中有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对于国家、叙事和想象的叙述,有于尔根·哈贝马斯关于公众舆论和公共领域的著述,有阿尔金·阿帕杜雷的文化流通概念,还有查尔斯·泰勒对于现代“社会想象物”的述行性创造的分析。讲座也会回到古典人类学关于礼物和交换的著作,比如马塞尔·莫斯、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和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等进行的研究,还有皮埃尔·布迪厄和雅克·德里达对其所作更新,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对金钱和资本的分析。

为了做到这一点,讲座将使用述行性的概念把两条研究路线归并到一起。第一条研究路线要回溯到“语言学转向”的最本源,回溯到人类学关于礼物和交换的研究。正是这种研究,尤其是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关于礼节、巫术、礼物和交换的著述,才激发了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于1949年写作了产生结构主义、因而开创了“语言学转向”的那本书——《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而且,也正是马塞尔·莫斯关于送礼的著作才继续激发了法国各类思想家,如埃米尔·本维尼斯特、皮埃尔·布迪厄、雅克·德里达和琼·卢卡·马里恩。

另外一条研究路线更为当代,关涉到我们这些一直与哲学家查尔斯·泰勒一起研究发展“社会想象物”概念的人。社会想象物包括“使构成社会生活的集体做法得以实行的共同理解”。尽管社会想象物的概念乍一看似乎太简单,承受不住置于其上的理论负荷,但当把它扩展到包括流通和交流的思想时,这将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概念。它把与“语言学转向”有关的许多问题带到了一起,产生了一个框架,这将使我们可以比较和对照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从巫术和礼仪到金钱和资本。

这种知识遗产的宽广范围表明,发展关于流通的一种关键文化视角要求超越学科的范畴,其概念空间要包含当代文化和哲学分析的一些最棘手、最繁琐的问题:述行性触及到语言学关于对象化和主体性、礼仪和意识形态表征的根本问题。虽然像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和朱迪丝·巴特勒等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仅仅偶尔进入到当代分析哲学中,反之亦然,但扩展的流通概念会产生的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将是发现:尽管存在学科差异,但对于建构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想象物非常关键的一些问题出现了。基本假定是:流通文化是由流通形式的符号性质产生的,社会群体是通过交换和流通的过程构建的,这种思想构成了不少交换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我们用这些思想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现象:(1)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礼仪和交换;(2)以资本为形式的劳动力商品化,形成了我们称之为“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3)风险的商品化,形成了位居当代全球化核心的“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

礼仪、交换和“语言学转向”的根源

把前资本主义社会礼物和妇女的交换和对金融资本全球化的分析扯到一起,似乎有点荒唐。诚然,也许听说过费希尔·布莱克和迈伦·斯科尔斯的人类学家不多,他俩荣获诺贝尔奖的发现——期权定价公式在全球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的传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个市场的年总值超过 100 万亿美元,现在已使全球生产和贸易相形见绌。同时,听说过马赛尔·莫斯的经济学家也不多,他的著作《礼物》引发了对交换和流通的讨论,从而在社会学和人文学方面导致“语言学转向”。然而,我这些讲座的论点是:要理解从妇女交换到金融资本流通的漫长进程,需要把两条思想线连接起来。

我们的观点是,流通不仅仅是人员、商品和资本的流动,相反,不管流通形式是库拉圈成员佩戴的袖箍,还是想象出来的民族主义共同体的小说和报纸,还是全球资本的货币交换,都预设并产生了阐释并使用它们的复杂“流通文化”。要解释这些流通文化,需要创造出一种复杂的元语言,这种元语言是从“语言学转向”引起的一些最困难的问题而来,比如自反性、述行性、对象化和自我指涉,还要求把它们应用到一般认为主要属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现象中去。

不过,为什么从莫斯开始呢?一个原因是,他的著作激发了一条思想线——法国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这对于社会学和人文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发展非常重要。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皮埃尔·布迪厄、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和雅克·德里达都明确承认他们的思想得益于莫斯。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莫斯为他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婚姻制度的结构分析提供了一个出发点。

布迪厄把莫斯关于送礼的时间维度的见解与维特根斯坦对遵守规则的评论方法结合起来,开始了对列维—斯特劳斯的解构,这将在德里达的论点(正是礼物的述行不可能性才使交换成为可能)中达到巅峰。本维尼斯特是把莫斯有关礼物的著述与欧洲大陆语言学和文学理论联系起来的关键人物,他写了论印欧语系中礼物概念的一篇经典文章,是语言结构主义、语用学和语言分析哲学之间的桥梁,他对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在1968—1969年为公众所知,此间他担任由他本人、阿尔戈达斯·格雷马斯、罗兰·巴特和列维—斯特劳斯创建的巴黎语言学会和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的主席。本维尼斯特也是语言分析哲学的大陆联系。1958年,在罗伊芒特会议上见到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之后,他向法国人介绍了述行性问题,这将在后结构主义中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他也看到了述行性在哲学上两个麻烦的领域有着根源,这就是后来在语言哲学上非常显赫的两个领域:自我指涉和语用学。

因为正是通过奥斯汀和述行性问题,法国“语言学转向”的这条路线才遇到了英美的语言哲学。在“语言学转向”的温室环境中,跨学科、跨国家的思想流通和交流形成了如此看法:语言研究不仅仅把社会学和人文学完全不同的方法联系起来,而且还为一门新的文化政治学打下了基础。述行性问题使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语言哲学方法相互接触,时有碰撞。奥斯汀从戈特利布·弗雷格那儿获得一些重要见识,并把后者的著作从德文译成了英文。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对语言逻辑具体化的双语评论是以戈特利布·弗雷格和伯特兰·罗素为目标的。美国哲学家索尔·克里普克的模态逻辑语义学直接针对最初由罗素和弗雷格提出的技术问题,他也把维特根斯坦对遵守规则的论述发展成为关于意义问题的更加

普遍的怀疑论观。奥斯汀从来没有明确批评过弗雷格,但他用言语行为的约定基础理论取代了后者的形式主义,这种见解后来被约翰·瑟尔发展成为一种完全成熟的言语行为理论。再后来,于尔根·哈贝马斯又由此发展了他的“普遍语用学”。哲学家戴维·刘易斯首先使用博弈论来阐明约定观念,然后针对弗雷格关注的问题之一:对语言语义学结构的分析。唐纳德·戴维森也许是近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批判了语言依赖约定这一似乎不言自明的真理,同时认为博弈论有利于意义的分析。法国后结构主义就述行性与语言分析哲学产生对抗,尽管许多主要思想家声称相互之间不可理解。德里达批评奥斯汀对于述行性和言语行为之约定俗成性的描述,因而引发了瑟尔的猛烈反击。但德里达对于语言的约定基础的怀疑论却令人吃惊地使他与戴维森结了盟。结果,德里达的“可重复性”观包括引用、直接和间接话语以及述行性,而戴维森对此作了更为普遍的技术分析。理查德·罗蒂后来写到德里达和戴维森在许多根本方面相互巧合,也许不会让人吃惊。

然而,追溯这些学系不仅仅是一场知识“拾荒”游戏,相反,巧合的那些观点为形成用来分析流通和交换的理论元语言提供了一套问题,这种元语言是可作为经济学和决策理论分析的替代选择。借助后见之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莫斯坚持以礼物交换为出发点,是要为追求实际个人利益的经济人提供一种替代选择。在特罗布莱恩岛民和夸述塔尔印第安人那样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礼物交换构成了一个“总体社会现象”,其中“各种类型的体制都在同一时间得到表述”(莫斯,1990,3)。虽然莫斯并没有否认经济上的个人利益在这些交换中的作用,但他坚持认为,赠予、接受和回报是截然不同的行为,它们的区别不仅在于时间上的不对称,而且在于

其竞争关系形成的地位和声望上的不对称,乃是那些社会里所有社会关系之基础。由于货币的使用和商品生产的兴起,交换变得相互、即时、平等,社会关系出现了一个正式和抽象的要素。莫斯强调,赠予在社交上和心理上是第一位的,经济人不是人类进化的先决条件,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特定表现。对莫斯而言,流通不仅仅是人员、礼物和商品的流动,而是由围绕着流通形式的阐释和使用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所形成的一个文化过程,构成了我们所谓的“流通文化”。最著名的人类学例子是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利诺夫斯基描述的库拉圈现象,莫斯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论述。

因此,在“语言学转向”的结尾,全球化之经济和文化方法之间的分离似乎在加速,这具有一定的历史讽喻。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从早期结构主义人类学关注“原始的”分类制度、神话和礼仪,转向了身份的述行性和建构主义方法。这种转向至少部分地反映出了一一种不同的语言概念。事后认识到,结构主义把语音体系模式应用到交换和流通,将会引入结构、动因和事件的问题,这将为转向语述和言语事件打下基础。后结构主义专注于述行性身份,可以被视为这种发展轨迹从结构转向事件的逻辑发展。述行性言语似乎以一个形式把结构和事件之间的矛盾关系明朗化:言语在指向自身过程中似乎形成了其所指事件,还有什么能比这更有说服力的呢?转向述行性也是转向言语行为和语言事件的语用学。正是在这一点上,后结构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开始汇合:在保罗·德曼和雅克·德里达的手里,约翰·奥斯汀的述行性/记述性区分将成为解构主义文本修辞学的元语言,而对于于尔根·哈贝马斯而言,言语行为理论将成为普遍语用学的基础。